

歷來的社會，原只
默許了男子的浪漫。而
今，中國新時期女作家
却以她們巨大的創造力，
掀動着大一統的世界。
女人與男人必將擁有同
一片天空，女作家與男
作家正在開掘同一座寶
藏……

ZHONG GUO XIN SHI QI NÜ ZUO JIA LUN

盛英 著

中國新時期女作家論

百花文藝出版社

中國新時期女作家論

盛英著

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

盛 英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 130 号)

唐山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5/8 插页 2 字数 240000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06-1088-0/I · 997 定价:6.00 元

目 录

心灵的烛照	朱 紫	1
我爱“辛德莉拉”(代序).....		4
她们更向往现代文明		
——试论新时期女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13
爱的权利·理想·困惑		
——试论新时期女作家的爱情文学		42
女性的自觉与突进		
——漫话新时期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67
真诚的追求		
——读部分青年女作家小说有感		79
努力为社会主义新人塑像		
——试评《解放军文艺》女作者专辑		88
关于爱情婚姻伦理题材的通信		95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读《枫林晚》、《祖母绿》、《错错错》.....		102
茹志鹃论.....		114

柯岩论	140
道德与诗情	
——试评张洁的作品	161
她同社会对话	
——试评张洁创作	167
向现实深处探索	
——读谌容的近作	185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读韦君宜中篇小说	191
清露无声万木中	
——试论叶文玲小说对美的探索	197
春天里初放的小花	
——读王安忆的小说	215
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形象	
——春江水暖她先知	232
——漫评王安忆的小说	249
高洁灵魂的抒情赞歌	
——读丁宁的散文	265
漫评杨绛《洗澡》	
——霍达的文学传略	270
——先锋派女作家——刘索拉	278
——“小镇现代派”作家——残雪	292
——王小鹰与她的文学天地	299
——石楠与她的传记小说	307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代后记)	318
—— 326	

心灵的烛照

朱 塞

当盛英同志把她多年心育笔耕的成果集束收获起来以后，希望书前有一篇序。她不忍心去打扰长者，也不敢奢望高明，便找到了同行中较熟的我。要求很低，“随便写点什么”，我才敢应允。

说我们“较熟”，确实是就比较而言的。其实我和她相识并不太久，那头次的见面，仿佛几天前的事情。

当时她是天津《新港》文学杂志的编辑，来北京组稿。《新港》的主编万力是我的老同学，托她顺便来看看，转致劫后余生的问候。不料她还是我们单位几位中年同志“复旦”中文系的同学。由于这两层关系，虽然初次见面，便有了广泛的共同话题，畅谈无所戒备顾忌。当时十年浩劫过去不久，不仅记忆犹新，而且遗迹还触目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风帆在破冰斩浪，但时有风横雨阻，虽然谈的是一些熟人私事，也不外是社会大环境，时代大气候中的风丝雨片。她并不多言健谈，由于正直坦率，总是无保留地倾吐衷肠，情形于色。有时候谈到别人的逆境遭遇，像她自身受到委屈，孩子般蹙眉嗫嚅。谈到令人宽慰高兴处，

便笑逐颜开，笑声朗朗。她的正直坦率中有一种童稚的天真。她那绞手的动作，也富有表情，从中可以看到她心绪的激动。不过，她宽慰欣笑的时候多，蹙眉激愤的时候少，即使嫉恶也不是那么如仇。后来我在她的《我爱“辛德莉拉”》中，看到了她自己的告白：

“也许我年幼时过分地倾心于童话，加上长期接受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人虽已步入中年，但依然怀着美好的憧憬、温良的心情，带着微笑看世界，看人生。‘冷眼’对于我来说，是那样地不习惯”。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温良微笑的外露坦诚。即使后来再没有更多的交往，也就成了老熟人。

后来她经常来北京组稿，而且有时就在我上班的社科院大楼走廊上相遇。看来她还是那副天真外露的笑容。但有一次电梯上的意外相遇：我中途登入电梯，她早已在角落里，既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留心周围的人，甚至自己此刻身在何处，似乎也没有留意。她陷入沉思。此刻她那不自觉的严肃内向表情，与那个笑容可掬的她，判若两人。电梯停止，她抬眼突然发现了我，彷彿觉得有什么失态，有些不好意思，随即嗔怪我不给他们的刊物写稿，调侃地掩饰过她一时的不自然，如往常相遇时那样，搓手欢笑。虽然仅是瞬间所见，却给我留下了另一深刻的印象：严肃内向。同时解开了我心中隐隐疑问：她在编辑岗位上，又怎能不断地著文？原来她是在组稿的旅途上、发稿的间隙里构思。她是一位刻苦的思考者。

她的评论文章，也给我留下了类似的相反相成的印象：既富感情色彩，又重理性分析。

在不长的时间内，写出这样数量的文章不算多产，也算勤

奋了。但她并不是这样的评论家：对于任何作品都能发表非常自信的意见，显得博识；也不像随时追逐着文学新浪头的浮标那样引人注目。她始终关注的是新时期女作家的创作。

她的作家论，都是把作者放在与其相近或相反，不限于女性的作家群体中，进行比较评析。不仅通过其作品描绘出创作者风貌，而且从群体的比较中显示其不同的艺术个性，展现了作者所处的文学背景。所以读来觉得内容充实严谨，视野开阔。有的虽然不是作家论，却是对同一作者发表的连续评论，是对作家的创作追踪。循踪者察其前进的轨迹，探讨其前进中的问题。即使对于某一具体新作的评论，也不是孤立的就作品论作品，而联系作者以往的创作，揭示其新的意义。除了作家作品评论，还有对女作家群的综合论述，女作家作品中涉及的爱情道德等专题的探讨。她最近写成的《她们更向往现代文明——试论新时期女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更是对新时期女作家创作的宏观考察。

这不是一般的评论集，而有独特的内容，近似专著。称为“新时期女作家论”，名符其实。文章本身也独具特色，在精细的艺术赏析和理论思辨中，还可以亲切地感觉到与自己评论对象之间的心神交会，用她的话说“犹如星星与灯火那样交相辉映”。这篇文章可以说皆是心灵的烛照。

一九八八年四月

我爱“辛德莉拉” (代序)

在美国，曾经把文学批评称之为文学艺术的“灰姑娘”^①，这个形象的比喻，引起了我对自己向往事业的遐想与思索……

辛德莉拉(Cinderella)，这个童话里的灰姑娘，陪伴过我少年时代，我尽管并未受过像她所遭的虐待，但是，一个姑娘决不屈服于歧视的精神因子，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底。

辛德莉拉，这个纯净得像水晶般的姑娘，还陪同我赢得了爱情。婚后，丈夫告诉我，他是把我当作“灰姑娘”才爱我的。

今天，辛德莉拉，又被人当作文学批评的雅称待之，而我恰恰从事了这项事业。真没想到，我的命运竟然会同“灰姑娘”扭结在一起，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应当怎样使“灰姑娘”从被轻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又应怎样使“灰姑娘”那充满淳朴、娟秀、智慧的魅力得以充分地发扬呢？有同志说我爱幻想，其实，我倒并不幻想文学批评这位“灰姑娘”马上成为文苑舞会上的皇后，像当前美国、日本等国家里那样；但是，我多么希望“灰姑娘”能得到更多作家、读者的爱。

也许，我年幼时过分地倾心于童话，加上长期接受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人虽已步入中年，但仍然怀着美好的憧憬、温良的心情，带着微笑看世界，看人生。“冷眼”，

对于我来说，是那样地不习惯。当然，我也承认，人类社会至今尚未获得良好的、理想的生存环境，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陋习、不正之风更令人焦虑或厌恶；我同所有富有正义感的人一样，对此，时时产生伤感、屈枉、悲怆，乃至激愤的心绪。但是，我信奉歌德的名言：“不幸者的第二灵魂是希望”。我相信，人类命运会在新的斗争中改观，中国前途会在新的创造中更富希望。在这大千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能够沟通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正可以在为改变人类命运、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事业中，发生感情与才智的共振，犹如星星与灯光那样交相辉映。我热爱这个世界，愿以我之热情灌注予人们，奉献给生活。正是这种对人类的爱，对祖国的爱，才使我同这个“灰姑娘”式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觉得优秀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在于他摄取、加工与赋形于生活的时候，表现出自己对生活精湛的判断与独特的见解，为人类提供了认识、改造世界的“眼睛”、气魄与耐力；而评论家的文学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生活的“再评论”，他由另一个角度，即通过对作家所创造的形象世界和作家本身复杂隐秘创作心理过程的探求，去感受、凝聚生活，感受、凝聚艺术，以致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同样为人类奉献生活的真谛。评论家与作家一样，都在审视生活中为真理而战。然而，我这个自以为很普通、很正常的想法，并没有被很多人所接受所赞同。记得前几年，一位正开始走红的天津作家曾焦灼地对我说，“当前，评论家不懂得作家，更解释不了作家的作品。”他期待评论家充当“作家作品的注释者”。那天，我被这番议论搅得心绪烦燥，甚至有一种受辱的委屈。噢，闹半天，连我的同龄人都像契诃夫那样，视批评家为马肚皮下的虻蝇，将他们置于依附与寄生的地位。契诃夫不承认俄国

有好的批评家，他认为正因为如此，以致于使“许多有益于文明的东西和许多优美的艺术品，就埋没了”。这些话，从表面看并没错；然而，从中透露出的他对批评不屑一顾的态度，却令人寒心。原来，作家们需要评论家，只是为了给他们的作品作注释和造舆论；他们究竟又是出于什么考虑，认为文明被批评埋没呢。其间，有着多么复杂而微妙的缘由啊。

文学评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须研究作家与作品，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开掘与注释，然而，这话仅仅描述了部分文学批评的范围或过程，远没道尽文学评论的全部内涵；尤其叫人挠头的是，它竟无视文学评论在生活面前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或者称之为人格的力量。

我不会忘记，在中学时代，正是中国评论家的文章，帮助我理解了契诃夫《海鸥》的象征意义。假如说，丹琴科在舞台上救活了《海鸥》，那么，世界上有多少评论家帮助契诃夫，点燃了千千万万青少年的心？契诃夫在世时，衷心地感谢了丹琴科，但他却没有看重过评论家们对于生活，对于他艺术的那种不可或缺的价值与意义。这实在太令人遗憾了。

我更难以忘怀，上大学时，我们这一代人对俄国的别、车、杜的崇敬与倾慕。三位批评大师，都以高度的原则性和敏锐的洞察力，关心与探讨社会生活以及文艺的潮流与趋势，以精湛深刻的艺术分析，丰富了一代人的艺术思想。我发现自己从他们的论文里感受到一股澎湃的人格力量，正如赫尔岑称杜勃罗留勃夫为“未来风暴中年轻的舵手”，我从这些精神舵手的论著里，获取着反对专制邪恶，争取美好未来的气度和智慧。我悟到，生活里有无数双手在塑造我的灵魂，而评论家与作家的手同样亲切而有力。优秀的批评家几乎都是出色的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告诉

你，社会潮流在怎样地颠簸人们，人们又怎样地同命运抗争。那里，有人生的感受与理解，有社会的知识与经验，有人的感情与个性，综合成一股富有魅力的人格力量。正是这种人格力量吸引了我，让我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位置。我愿通过自己的心智，让文学与生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推动作家向生活深层进军，帮助读者与作家携起手来，一起认识并改造这个偌大的世界。

诚然，文学评论对生活发表“再评论”，决非为通常意义上的政论或言论，它是通过研究作家如何“再现”生活、“表现”思想感情的整个艺术分析来实现的，要探研作家的审美和心理过程，要探研作家艺术上的追求，要探研作品的思想艺术特征，等等。当前，评论界开始引进西方各种门类的文艺批评方法，这对我们开拓视野，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我以为评论家主体的艺术感受才是基础性的东西，它如同生活库存对于作家创作一样，具有最为突出的意义。

1979年春，我同两位朋友一起访问秦兆阳同志。当他谈及《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时，曾坦率地告诉我们，“我不像你们都上过大学，学过很多理论。我当时的观点主要是从工作中、读作品时有所感受，有所感觉才提出来的”。这位前辈作家、评论家的经验之谈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平时，我在编辑工作中也害怕读那些新的八股文，这类文字没有独特的感受，乏于新鲜的见解，总是把鲜活的作品“套”在或“塞”入某个政治框架里，某个艺术概念里，结果实在干枯得像瘪三。我想，我是不能走那条路的。

艺术感受，并不是那种机械性刺激后的直觉反映，它是生活经验、心理素质、文化构成、艺术修养的综合反应。它有先天性因

素，但主要是在审美实践中形成、积累和发展的。我从小喜欢看戏，对于舞台上的悲欢离合尤为敏感，常常陶醉其间，心灵为之颤动。记得大学生活期间，我默读郭沫若剧本《屈原》的雷电颂，竟然也会热泪滚滚，难以自控。对艺术领域里的人生，我自有一股神往之情。这种气质是有助于艺术感受力的滋生和滋长的。然而，近几年来，当我利用编余时间开始文学评论写作时，却感到对于一个评论家来说，单凭朴素的感受力，实在是太有限了。朴素的感受力须在知识与文化的结构中浸濡营养，须在开放性与创造性的思维中变革发展。只有蕴涵了对艺术深刻理解的艺术感受力，才是文学评论的基础之一。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常常伴随着理解、想象与感情等心理活动；我体会，评论家对艺术的感受，倘若没有对艺术及其发展轨迹的丰富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这种感受只会停留在一般感动上，虽真诚，却肤浅，难以发现和开掘形象世界的底蕴，无法进入深层次的艺术思考与分析。其实，真正的艺术感受力是一种深刻的艺术直觉，对于艺术自有一股透视力。

我热爱中国自己的评论家、美学家。尤其前辈评论家、美学家们，他们对艺术的具体鉴赏与判断，总是那样地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他们的艺术感受总是能极有个性地呈现出来，有的尽管流于琐细，但毕竟含蕴了很多有价值的艺术见地，思精义丰，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我喜欢孙犁、黄秋耘、钱谷融的评论文字，对朱光潜、王朝闻、宗白华、伍蠡甫的美学文章更爱不释手。近来，读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顿然感到神智为之一爽。钱先生在《管锥编》里，常常就一个比喻、一个意境、一个表现手法，引证出大量中外例子，以此来突现他的艺术思想。艺术感受总是同理解、知识、观念融为一体。因而，对艺术的研究，要敏感，不

敏感就难以感受；要博学，不博学就难以比较；要深刻，不深刻就难以分析。艺术感受沉浸在整个智力领域里才能得以升华。倘若智力出现软弱无力的可悲征兆，那么，艺术感受力也会相应地枯萎与凋谢。

为了保持艺术感受力的旺盛，我爱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我身体很不好，记忆力也糟糕，但这一切都阻碍不了我对书的感情与读它们的毅力。假如说，我写文章的劲头不算大的话，那么，可以讲，我是以三、四倍于写作的力量在读书。青年时期读中外名著多，现在涉猎的领域要广些，我最爱读伦理学、心理学、美学以及关于未来预测的书，对于传记，我也是很偏爱的。可惜的是，我把大学时代学得非常好的外文给丢了，否则，我将能从多少窗口去窥视各色世界啊。

对于生活这本大书，我也是认真的。以前，我过于天真，只求生活得有意义、心情愉快就行，很少去品味、体验各种事宜，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缺乏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这些年，我开始懂得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倘若贫于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乏于对社会进程的深刻理解，那么，他连一个注释者也难以承担。1982年，我为《文艺报》写过一篇关于谌容近作的评论，当时，《文艺报》有同志认为，我对谌容农村题材作品的分析不如对她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分析。他的批评直插了我不熟悉农村的天然弱点，此时，我更觉悟到对生活这本书非认认真真地去读不可了，也要来个博闻强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注意各个领域的活，变得多思起来，爱咀嚼人生的各种滋味，爱探研各种精神现象的缘由与特点，爱关心社会变革中的种种矛盾的内在联系及其必然性……美国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赖依提出，“文学批评要有自主力量”，我以为，这个自主力量，正是评论家对生活和艺术的独特感

受。

阎纲评论我的批评文字“重感情色彩”^②，我是同意的。其实，感情是感受的高级层次，感受深切的文字，总会顽强地“表现自我”、“流露自我”，扩张主体，从而呈现出个性特征。我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常自觉不自觉地抒写对人生、对社会、对艺术的某种意念与情趣，以宣泄自己特定情势下的特定思想与感情。当然，我有时也难以将零星的艺术感受连缀在一起，使其汇合成具有冲击力量的感情之流，因而文章的感情力度并不强大，主体意识尚未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更谈不上形成个人的风格了。这正是须要引起自己深思的事情。

假如说，我对文学艺术尚有些浅显感受力的话，那么，应当毫不隐讳地承认，同艺术感受力相比，我的理性思考力要软弱得多。尤其当一大批评论新秀以其深邃思辨力提出某些新观念、新见解的时候，我更为自己感受力与思考力之间的矛盾而苦恼。其一，长期的直线型思维方式，使我习惯于明晰的、单义的理性分析，在愈益复杂的艺术形象面前，我或者困惑，或者难以把较为繁富的艺术感受条分缕析，充分地表达出来。其二，尽管能凭直觉对艺术作品获得个总体印象，并侧重在对艺术内部构成的考察上，然而，我毕竟不善于辩证思维，尤其乏于系统的宏观综合能力，因而研究的格局偏窄、偏浅。其三，理论基础的不扎实与理论观念的部分老化，从不同方向使我容易停留在感受阶段，难以将作品中社会历史的、哲学的、心理的、伦理的诸因素融会贯通，使它们统一于整体人生和社会本质真实之中，这样，我常常怯于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没能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为理论抽象提供新鲜的看法。

其实，我有较浓的理论兴趣，也没丧失起码的逻辑思维能

力。在我的家庭里,好几个人都从事理论工作,他们那种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启发着我摆脱直线思维习惯。但不知何因,在理论思维领域里,我实在不易开拓出一个新天地来。难道女子就只能当一个唯有艺术感受,欠缺理性思考的“半截子”评论家?当然不是的。富男子气的刘思谦,她评论的理性色彩不是得到社会的公认了吗?性别是次要的,问题还在于审美主体本身的构成有缝隙,须弥补。

这些年,我重点评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其间,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很多,我常常依据她们的特点,每写一篇文章,重点思考一、二个理论课题,包括艺术问题。新时期优秀女作家的精神追求,层次都不低,她们都关心“人”的价值与命运,关心女人的价值与命运,几乎都期待人的全面性的实现;为此,我潜心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述,并阅读一批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论著。这样的学习,理应使我拨开雾障,为“文学是人学”这个光辉的事业有所建树,然而,我却是那样地脆弱,一直没能把学到的精华调动起来,将其熔铸在自己的文章里。就是在提出青年作家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具“人道感”^③,提出“人的自我更新”等命题时,我仍然有一种底气不足的感觉。为什么呢?是空气中有凉意,我成了受惊的“寒蝉”?不,我的禀性蛮耐寒哩。关键是,自己没能建立起一个理论构架,倾心、倾力于理论领域的努力还不到家。

优秀的文学批评,除了要有感受,有理解,要有知识和经验外,更有赖于理论上的更新与发展。现在,我宁可放下预定的写作计划,穿插撰写了一些更靠近理论探索的文字。像同航鹰合作完成的《关于爱情婚姻伦理题材的通信》,虽然发表在地方刊物《星火》上,但还是引人关注的。为了改变“半截子”评论家的势

态，我决心下功夫锤炼自己的理性思考力，学会将微观的赏析判断方法与宏观的整体综合方法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评论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线。

才有庸雋，气有刚柔。论才，我心不灵手不敏；论气，我缺乏阔大恢弘的品格。但我还是自慰“灰姑娘”不丑。她那内在的性格的美，总会给生活增添亮色，给人们带来真诚的。我爱辛德莉拉……

1985年10月

注：①见威勒德·索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第295页，北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

②见《新时期的小说评论》，《批评家》第一卷第二期。

③见《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形象》，《青春》丛刊1984年第一期。